

# 第一章 绪 论

人口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人口地理学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人口分布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核心的问题是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地关系。其中主要研究人类如何改造和调整自然环境系统，使之与人类环境相协调，更好地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服务。人类是协调各种关系的主体，因此人口地理学研究对于促进人口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口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人的总和。对于人口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人口地理学就是从空间角度去研究人口问题。离开了一定的地理空间，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就无从谈起。所谓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人口问题，不仅指研究一个地域内人口生产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主要是针对每一种人口现象的空间运动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也从人口同特定空间的各种自然、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人口地理学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形成各具特色的人口地理特征，其中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人口过程在空间中的运动总与它在时间（也即历史）的演进密切结合在一起。不同

时点的同一人口现象与各种人口现象之间，以及各个时点上人口与社会经济现象之间，按照时间序列发生着纵向联系。总之，人口在空间序列的运动及其在时间序列的发展变化，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同一地域中的人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口现象的区域性特征就会有很大区别。

总之，人口地理学以人口过程的空间形式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把人口全过程中各种人口现象的空间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即人口在空间的分布、组合、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变动的空间分布、空间组合、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时空中的发展变化过程。因此，人口地理学研究对象可以这样表述：人口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口现象的地域特征、空间差异、区际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人口地理学的中心任务是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各种人口现象在区域分布上的区内相似性与空间差异性，阐明人口地域分布不同的原因，评价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寡，增长速度的快慢，人口密度的大小，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迁移流动以及各种人口结构类型和居住形式同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促进或控制人口地理分布、区域人口增长、人口移动结构和人口居住类型等的主导因素，分析人口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等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并测算其影响程度，预测各区域人口生产与再生产和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的演变趋势，人口与其居住环境的变化趋势，从而为制定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土开发整治与环境治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生产力布局，城乡居民点布局与建设规划，

以及制定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区域人口政策提供客观依据。因此，各国各地区在各时点上的人口数量多寡、密度大小、增长快慢、质量高低、婚姻家庭、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居地类型等重要人口现象的地域特征及其与自然、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心理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后果，都是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本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相互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去观察、认识和解释人口地理现象。此外，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也常是分析人口地理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 描述法。它是一种传统的方法。就是运用记述的方式，把人们所观察到的人口或人口地理现象记录下来，对其进行分析和描述，以揭示人口同自然、社会因素间的关系。我国历代哲学、政治、历史与地理学家都曾在各种著述中，记载和描述过人口地理现象。

2. 区域综合分析法。人口地理现象与其所处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研究不同地域的人口问题，必须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分析该区域人口与自然、经济、社会的相互联系，认识其相互作用的影响，从而发现并解决矛盾。

3. 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在一定时间内，人口地理现象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研究某一区域的人口地理现状或历史上某一时点的人口地理特征，都必须对该时点相对稳定的人口地理现象进行静态分析，才能认识该时点的人口地理特征。但人

口地理特征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必须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动态分析，把各个时段的人口地理特征联系起来看，对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其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

4. 定性与定量分析法。在人口地理研究中历来重视定性分析，但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如简单的图像分析，很难确切地从各种复杂关系中找到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因素，而运用人口计量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模拟，就能在复杂的关系中找到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为认识人口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提供可靠的研究手段。在用计量分析法与数学模型方法时，应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因为有许多不确定或难以定量的因素用计量分析难以做到，用数学模型模拟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人口地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可通过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同当地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特别是同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与生产布局的关系，揭示出人口数量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为进行合理的人口规划与布局提供依据；可以通过对不同区域居民的婚姻、家庭、出生、死亡、人口迁出、迁入的分析研究，对比其区际差异，分析影响人口变动的原因、后果及发展的规律性，为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迁移变动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研究各国各地区人口素质特征与其地区差异，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素质差异的原因，为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提供决策性意见；通过对各种人口结构的地区类型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寻找出调整人口结构的途径与应采取的措施；研

究各区域人类居住地的重要规律、职能等的特征与形成条件，揭示居民点分布的规律，为制定合理的城乡居民点发展规划提供客观依据和建议。

人口地理学既要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人口科学所涉及的各种人口现象，又要用人口科学的理论观点分析人口地理问题。因此，就其性质而论，人口地理学是介于人口科学和地理科学之间的跨界学科或边缘学科，与它关系最直接的相邻学科有两大系统：人口科学系统和地理科学系统。在人口科学系统中同人口地理学关系最密切的是人口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人口生态学。在地理科学系统中，与人口地理学有直接联系的是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地理学与地图学。此外，城市科学、经济科学也都与人口地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系统地了解人口地理学思想的发展和人口地理学的形成过程，需要从它的“源头”谈起。人口地理学的形成始于西方，但中国历代文化典籍之中，有关人口地理的思想、观点和纪实性人口地理材料也都有所记述。

## 第一节 西方人口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早期，同一思想往往混杂于各种不同的著作之中。古代人口地理思想和人口地理材料就混杂于古代的诗歌、历史、哲学、政治、地志和旅行记之中。

### 一、古希腊时期的人口地理思想与人口地理材料

#### (一) 前期

西方文化以古希腊为主要发祥地。波希战争以来，以雅典

为代表的希腊文化获得了很大发展，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历史等古代科学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古代地理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料，里面包含有大量人文地理材料。其中记述了多利亚人南侵、希腊居民被迫向列斯堡和小亚细亚北部迁移的情况，以及希腊及其邻近地区的地理情况。同时，还有关于氏族制度、社会分工、部落生活以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叙述和使用铁器的记载。西方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曾把荷马尊称为古代地理学之父，把《史诗》中的《奥德塞》作为地理读本。

公元前 7~5 世纪，米利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赫卡泰，根据商人和水手们提供的材料写成《地球的描述》一书。书中虽然有许多不实之处，但它毕竟是专门描写地理现象的第一部著作。另一位著名的古代史学家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一书，书中记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各地区的人文地理情况，其中有不少地理方面的材料。有人把这部历史著作看成是希腊、西亚和北非的地理通志。稍后一点的修昔底德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他记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人争夺希腊霸权的战争史，其中描述了希腊各城邦的社会、经济、地理和居民生活情况，也有不少人文地理材料。埃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写的《远征记》中，记述了西亚地区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也包含有人文地理方面的材料。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从理论上探讨人口与经济关系、并最早推出城市国家人口合理规模的学者。柏拉图在其国家治理思想中构想了用和平取得秩序的理

想城邦。按照他的构想，城邦中的总人口控制在 5040 人最佳。这是因为在城邦中土地和财产是一定的，因而居民数量也应当一定，而 5040 人是他认为的最佳人口规模。他还论述了保证达到最佳人口规模的种种方法，如在婚育政策上规定男子婚龄为 25~55 岁，女子婚龄为 20~40 岁等等。为了保证最佳规模上的人口最优值，柏拉图还论述了优生优育的方法。保持最佳人口规模的困难除了人口不足的可能性外，还在于经常出现的人口过剩。柏拉图在他的晚年著作《法律论》中论述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正常的人口增加是使具有良好秩序和一致和谐的城邦国家产生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他的观点，消除人口过剩的最好方法是堕胎和弃婴，同时也可以考虑向外移民或殖民。

可见，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以土地和财产为前提，在此前提下，为达到他所设想的种种理想，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来保证。这实际上是以人地关系的最适度来判断一个国家（城邦）是否理想。柏拉图关于人地关系的这种思想，为其后的亚里士多德所认同和接受，不过亚里士多德更倾向于“小国寡民”，主张用小城市、小国家取代大城市、大国家。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人口过多的城市不好统计”，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就是足以满足生活的目的和一望即可招之即来的最大的多数”。值得重视的是他注意到了“市民”与“财产”的关系，第一次揭示了人口与财产之间的矛盾，认为市民贫困的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不注意调节财产积累与市民人数增长之间矛盾的结果。

## （二）后期

公元前 336~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进行了东征。这大

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许多随军学者了解并吸收了不少东方文化知识，从而使希腊文化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地志、旅行记、远征记和回航记。当时有一部埃拉托色尼的著作《地理学概论》，第一次使用了“地理学”这个名词，并明确指出地理学应把地球作为人的家乡来研究。所以他的地理学著作着眼点在于把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联系起来。他把当时已知的世界划分为欧洲、亚洲和利比亚洲三大洲，以南北纬  $24^{\circ}$  为回归线， $66^{\circ}$  为极圈，把地球划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和两个寒带；按照纵横坐标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最先提出，由现在的西班牙沿同纬度向西航行，最后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再从地中海返回到西班牙，环绕地球一周。他的这一论断终于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他还计算出地球圆周长为 25.2 万斯达波（约合 39690 公里）的数据，这与地球的实际距离相差无几。由于埃拉托色尼在地理学上的突出贡献，被西方近代地理学者公认为地理科学的奠基人。

## 二、近代人口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蕴藏着古代人口地理学萌芽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到中世纪完全被天主教的宗教迷信说教和教皇的无上神权扼杀了。直到 15 世纪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成长，“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并发展壮大，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各种学术思想才得以新的面貌蓬勃发展起来。人口地理思想也才不断得到发展，并终于成为独立的学科。但人口地理学在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前，主要孕育于人文地理学中，而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人口地理学的发育也有所区别。

### （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随着地理大发现，航海、探险和向新大陆的移民活动日益频繁。资本主义工厂与手工业的发展、国内与国际贸易交往的日趋频繁，不仅为古老的地理学开拓了新的天地，而且也向地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重新认识地球，探讨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准确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知识。所以从地理大发现初期开始，便有各种描述地球和有关探险的旅行记、航海指南、各国各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的描述以及理论地理学著作、地图绘制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地理大发现初期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为彼得·阿皮安的《宇宙学导论》和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宇宙通志》，特别是后者，主要是探讨亚洲、非洲和新大陆情况及德国人文地理特征的描绘性著作，有较大的实用价值。1650年德国早期的地理学家贝恩哈特·瓦伦纽斯出版了《普通地理学》一书，这本著作几乎无所不包，成为一部百科全书性的人文地理著作，对欧洲人探寻新大陆起过很大作用，对地理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18世纪中期，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讲稿》中，强调人文要素是地理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揭示了把人的成果都看成是依附于自然的外部表现。康德认为一切自然和人文现象都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性格、思想和文化都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而自然则是绝对精神，一切人文现象都是神的意志的表现。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思想对地理学的深刻影响。18世纪末，布韦伯爵对康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其著作《自然史，一般的及特殊的》一书中指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居于主要地位”。从而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有力地反驳了“神的意志论”和地理决定论。布韦的思想对后来的人文

地理学有深刻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初期虽然多数学者持有浓厚的“地理决定论”观念，但这一阶段的地理学毕竟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唯心主义地理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刻的研究，为后来的人地相关论奠定了初步基础。

## （二）产业革命以后

产业革命以来，地理学不仅形成为真正的科学，而且不断分化出各分支学科。首先是分离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分支，进而又分化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人口地理学也逐渐在学科分化中形成了自身的科学体系。

19 世纪以来，一批以记叙和描绘为主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著作大量涌现。以洪堡、李特尔、拉采尔、李希霍芬、布拉什为代表的近代地理学家相继发表了各种地理著作。这些人文地理著作，一方面比较系统地描述了各洲、各国、各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另一方面也论述和探讨了一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使地理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科学体系和方法论，同时也为人口地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近代地理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人地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人口地理学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西方多数地理学的奠基人和著名学者都持有“地理决定论”观点。以洪堡、李特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理学派是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也是“地理决定论”的倡导者。他们在研究人地关系问题时，把整个地球及附着在它表面的一切自然和人文现象都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认为通过自然与人文现象地区分布的差异，可以“抓着被表象掩盖的自然实质”，看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影响。洪堡、李特尔对近代地理学的形成也

有过重大的贡献，其中包括对人文地理学说的贡献。在李特尔之后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对近代地理学的形成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民族学》、《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自然与文化地理学》、《论中国人的外移》等著作对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他同时代的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以及之后的阿·赫特纳也是地理决定论者。就在德国地理决定论风行的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则提出了“人地相关论”。白兰士在《人文地理学原理》中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布拉什也主张从“地区、位置与分布”方面去研究地理问题，但更强调“景观”，他的这一主张和赫特纳关于景观的论述，后来形成为一个新的学派——景观地理学派。

白兰士的学生让·白吕纳继承和发展了“人地相关论”的思想。他在《人文地理学：原始分类的尝试》一书中，以人类在地球表面活动的“可见的和确定的事实”为基本材料，建立了他的人文地理学体系，认为地理学应在各个特殊的地区内研究这些事实，揭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认为地理学还应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即历史地理。白兰士的另一学生阿尔日·德芒戎也主张地理学应集中研究区域，分析区域的不同特征，并综合这些特征去揭示组成各个区域类型的所有现象的互相结合情况，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联系起来，以此来说明人与地的相互作用。总之，法国人文地理学的人地相关论，虽然否定了“地理决定论”，但却陷入了“二元论”，最终仍未跳出地理决定论的圈子，但它对人口地理学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法国人文地理研究中，有关城市地

理、聚落地理、人口迁移地理等也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 第二节 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人类起源之地和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古代人口地理思想和人口地理材料十分丰富。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的四五千年中，在各种远古传说和历代文化典籍中保存了许多人口地理资料，为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口地理学大约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西方引进，在解放初期因受苏联学派和“左”的思潮的影响，一直未能得到发展。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口地理学研究才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 一、我国古代的人口地理材料

#### (一) 秦汉以前

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人口地理著作，但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却蕴含有丰富的口地理资料。在起始于商代前期的甲骨文中已见到有关地名、山名、水名、部族和人名的记载，上面简单地记录了祭祀、狩猎、农事和部族间的争斗等情况，这可以看作最早的有关地理资料。商代后期出现的金石文，对人口地理记述的情况很少。直到西周以前，关于人口地理的认识只能靠传说去推断。这种传说多见于春秋战国时代用竹简书写的古代著述中如孔丘的《易》、《礼》、《诗》、《书》和《春秋》等五经，关于我国古代的人类活动记录很多。《易经》中有对于人与自然的认识，《春秋》和《尚书》虽都是历史著作，但都有关于人类活动和地理状况的记述，特别是《尚书》中的《禹贡》篇，更被公认为一篇具有系统地理思想的杰作，在短

短的 1200 字中，除记述了我国的山川大势外，还按山川形势把我国划分为九州；按颜色和质地对土壤进行了分类；以王都为中心，按方位把华夏各族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表明了《禹贡》对地区差异的认识和区划思想，对我国古代民族的地域差异有了明确认识。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许多诸子百家的著述中都有关于人口或人口地理方面的记述，如《商君书》、《墨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等 它们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作者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观点。

## （二）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直到明清时代，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均有关于人口地理问题的记叙，这些著作大体分为以下三类：

1. 历史类。秦汉以来，我国共计有 24 部历代官修史书，加上近人编写的《新元史》和《清史稿》，共 26 部，均有关于人口及人口地理方面的资料。《史记》中的《平淮书》、《货殖列传》、《河渠书》和人物的列传中，记述了西汉时的户口数字、人口分布、土地、物产、田赋、贸易、交通、都邑与民俗情况。《汉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汉书地理志》、《沟洫记》和《食货志》一向被地理学界推崇为我国记述地理的开篇之作。

2. 地理图志类。方志（即地理志）是一类综合性的人文地理著作，无所不记，无所不包，对研究人文地理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的方志很早就有，周代已有《四方志》和《邦国志》。东汉以后，区域性方志逐渐兴起，如东汉《交洲异物志》、三国时的《南州导物志》、晋代的《吴兴记》、《南徐州记》、隋代的《诸郡物产记》、《区宇图志》、《诸国图经集》均

有大量人文地理方面的记述和都邑分布地图。8世纪后期,唐代学者贾耽曾编绘《陇右山南图》,并撰注录10卷,兴元七年(公元784年)又绘《海内华夷图》撰《古今郡国四夷述》40卷,对唐代郡县与四夷邻邦的自然人文地理概况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称得上是唐代权威性地理著作。宋初乐氏所编《太平寰宇记》最著名,共有200卷之多,大部分篇幅记述各州郡县历史、地理情况,后29卷记述了四夷情况,称得上是一部中外地理丛书。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陈俨、虞应龙等汇编《大元一统志》共600册,1300卷,对元初的疆域、隶制沿革、户籍丁壮、四至八到、坊郊乡镇、名山大川、人物风俗、文化古迹以至寺庙观刹,无不罗列,堪称我国最详尽的志书。明代最著名的方志是由明英宗第二次秉政(公元1457年)命儒臣修纂的《大明一统志》。清代及民国时代地方志的编纂仍然非常盛行。总之,这些地方志书,实际都具有人文地理丛书的价值,对研究我国人口地理都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文献。

3. 其他古代典籍。除史书、地理志、地方志之外,涉及人口与地理、人口与经济的古代典籍还很多,较重要的有《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如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制、州郡、边防八门,其中的食货、州郡与边防三门有大量关于人口与人口地理的资料,对后代研究我国历史时期人口变化有重要意义。宋末元初杰出的史学家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也是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文献。

## 二、我国古代主要的人口地理思想

### (一) 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和发展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科学技术手段极端落后，人们对自然盲目崇拜、感到恐惧，并把神或上帝看作是万物的主宰，这为以唯心论为基础的“天命论”和“不可知论”敞开了大门。然而在古代也出现了某些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如孔子《易》中的乾坤、阴阳之理，就把人与自然的形成看成是阴阳对立、交相感应的结果，从而排斥了天命论的观点。《孟子》中首次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而荀况更明确提出了“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人天互胜论。类似的思想观点在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

## （二）人口调查统计思想

我国历代对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都十分重视。从西周以来，历代均设有专门掌管户口的官职。《周礼·秋官》记载，周初就设有“司命”之官，“掌登万民之数”。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强调“四境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并要求能分别“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也是指进行详尽的人口调查统计。其后，历代都对人口调查统计工作和户口管理非常重视。

## （三）主张增加人口与减少人口的思想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主张增加人口的思想一直占支配地位，而主张减少人口的思想比较少，只是到了近代，节制人口的主张才多起来。我国古代人口稀少，增长缓慢，加上战争影响，人口逃亡严重，各地普遍感到劳力不足，兵源短缺，需要增加人口的愿望十分强烈。商代青铜器上就有“子孙永昌”、

“万年元疆”的祝辞，反映出当时人们祈求长寿和子孙昌盛的愿望。《诗经》中有不少诗歌表现出多子、多福、多寿的思想，如“宜尔子孙”；“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等。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君和政治家、思想家都把增加人口作为基本国策。孔丘、商鞅、管仲、孟轲、荀况等都是地广人多论者，墨翟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鼓励人口自然增殖的人。但也有人主张“小国寡民”和独唱“民众财寡”的论调。如韩非对当时的韩国人口过多深感忧虑，认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偿累罚而不免于乱”。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把战乱根源归罪于人口增加的人。

康熙秉政，采取了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人口明显增多。康熙五十年（公元 1711 年）人口已突破 1 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公元 1834 年）更逾 4 亿大关。咸丰以来，人口虽一度大幅度减少，但到光绪以后人口又迅速回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口过多论和主张控制人口的言论逐渐多起来。早在明代中期丘浚就提出“生齿日繁”、“地狭而田不足以耕”。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意言·生计篇·治平篇》中认为：在无外部因素干扰下，人口增长速度将远远超过物质生产的增长速度的理论。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他主张应采取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但他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不会改变人口过剩问题，表现出一种绝望的悲观情绪。还有一些持有和他类似观点的学者，如冯梦龙、任起运、陈梦波、汪士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

#### （四）徠民兼人与留民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有的国家为了补充劳力、发展生产、争霸

诸侯，采取了一些招引他国人民归附的政策，并采取措施限制本国人口外流。于是徠民、致民、兼人与留民等思想与策略都出现了。商鞅是提出“徠民”政策的第一人，他提出：“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务徠”。为此，他制定了“制土乡民之律”和“徠民”政策。战国后期，诸侯割据时代即将结束，各国相互兼并的形势愈演愈烈。荀况认为“兼人”即以德服人。兼人有三种办法：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在这里，他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弱民贫不在于人多，关键在于不要相互征伐，“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者不能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人口逃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所以《管子》中提出了“留民”建议，以防止人口的外流。

#### （五 移民问题的主张与政策

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不少人口迁移的活动。史称夏后氏有十迁，商人六迁，周人七迁。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以后的移民，多数是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有的把移民作为防止叛乱和充实边疆、巩固国防的一种手段。移民实边政策始于战国初期楚国吴起，他曾“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秦统一六国后，为有效地统治新占领区，防止六国反秦势力的反叛，曾多次把六国贵族迁移到易于监视管理的地区。汉初也多次组织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但都是由中央政权组织的强制性移民，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目的。到西汉文景以后，这种强制性移民改为自愿移民，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 （六 关于人地平衡思想